

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再审视*

刘 儒 韩丹丹

[摘 要] 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机器日益嵌入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领域,由此产生了“劳动者主体地位有所动摇”“活劳动不再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等观点,这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面临挑战。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围绕劳动主体和价值源泉产生的争论,我们必须确证,人工智能不具备认识主体的属人性,人仍然是物质生产活动和非物质生产活动的唯一主体;人工智能不创造价值,人类劳动仍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人工智能不会使劳动阶级成为无用阶级,在彻底消弭了异化劳动的共产主义条件下人工智能将成为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有力手段。历史和实践证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并没有“过时”,仍然是理解与阐释人工智能时代社会财富生产和价值创造的科学理论,并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

[关键词] 人工智能 劳动价值论 主体性 历史唯物主义

DOI:10.15894/j.cnki.cn11-3040/a.2024.06.010

当前,全球正掀起以新一代人工智能为核心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人类迈向智能化时代,呈现出一系列革命性和颠覆性特征。伴随着人工智能广泛赋能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活动,社会财富和价值总量实现指数级增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揭示的“人类劳动具有主体性”“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等核心观点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有学者提出,“劳动价值论已经不再适用于弱人工智能时代,弱人工智能生产创造价值”^①;还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变成了劳动工具和劳动者一体化”^②,从而赋予人工智能劳动者地位等。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论域中,人的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赋予人工智能价值创造属性无疑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根本

否定。基于此,我们有必要确证:人工智能从属于机器范畴,不可能突破马克思提出的“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由它的服务所生产的产品上”^③的科学论断。从人工智能的本质出发,厘清人工智能时代价值的真正源泉、探寻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逻辑

*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背景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研究”[项目编号:18JZD010]的阶段性成果。

- ① 胡斌、何云峰:《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论与劳动制度》,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 ② 黄欣荣、张魏欣:《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解放》,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444页。

和当代意蕴仍是我们在坚守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面临的长期课题。

一、人是物质生产活动和非物质生产活动的唯一主体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范式不断发展和升级,其依托算法和数据调用前置性植入的认知原则、操作体系和修正机制的技术逻辑持续冲击着人类的认识界限,进而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是否具备认识主体属人性的思考。因此,辨析人类思维与基于大数据算法的机器思维的本质性区别尤为必要。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论域中,人毫无疑问是唯一的劳动主体,判定人工智能能否成为劳动者,也必须以人类的主体地位作为参照。马克思指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①人的主体性体现在人的劳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实践活动展现并确证了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和社会性。有别于人类的“灵活性”与“自由性”,人工智能体现的则是“程序性”和“机械性”。

首先,人工智能不具备能动性。在哲学认识论中,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具有能动性,是唯一认识、利用、控制、改造和创造物的主体。“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②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拥有的是一种全面劳动能力,可以通过自主学习和创新实践改造和利用自然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③;而人工智能尚不具备通用“劳动”技能,其“劳动”技能必须依托人类设定的前置劳动系统方能实现,它只是把主体的认识能力转化为认识客体,并对其进行学习与模仿,无法脱离人类预设程序进行自主劳动。究其本质,人工智能的作用机理是在算法作用下对人类大脑的延伸,所谓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是人“教会”和“赐予”的,其选择与决断来源于人类在固定领域赋予的内嵌程序和数据,而固定程序一旦形成,无论人工智能如何表现出独立生产的能力,都不可能突破程序限制,发生本质性变化。

因此,人工智能仅是执行人为嵌入的指令,在

固定领域发挥作用,不仅不能获得自主反思的自我意识,也不能形成自己的目的认知。例如,Alpha Go能够在围棋领域战胜人类智能,但对其他领域一窍不通。不可否认,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内蕴深厚的潜力,其应用也随着技术的进步与成本的降低扩展到更多领域,但这些取得了现象级技术进步的人工智能,仅仅是在执行固定的算法任务,仍然不可避免地受限于常识学习、跨领域模型迁移、小样本和零样本学习等技术上的拦路虎。无论人工智能获得多少数据和算法,其程序数量总是有限的,会在算法局限、数据质量和算力弱点等方面面临无法消除的问题。而人类智能具有无限创造性,拥有无法转化为算法和数据的信息,这是人工智能所不能媲美的。人工智能要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需要突破由人类智能为其设定的特定目的以及自身限于固定领域的局限性,以便能够在生产过程中进行能动性活动,显然这是当下的人工智能无法达到的。

其次,人工智能不具备创造性。人类作为认识主体和劳动主体,能够做出具有选择性和创造性的活动。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人作为实践主体具有积极、能动地反映客体本质的能力,可以依据自己的选择自主作出判断并瞬间变更行为,这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对客体的控制、支配、掌握与利用。不仅如此,人也能够按照自身需要规定实践客体,创造自己的生存条件,人与自然通过劳动而不是通过完全依附所形成的关系是区分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的根本方面。人作为实践主体,必须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实践客体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创造条件,正是在此基础上,人类的其他基本活动才得以展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互关系才得以实现。反观人工智能,其活动是一个无意识过程,需依赖特定领域的先验知识与程序键入,无法实现创造性步骤,“就像满屋的猴子噼噼啪啪地敲击打字机,即使过去一万年,也写不出一幕莎士比亚戏剧”^④。所谓人工智能的“创造性”,不过是对人类已有智能学习的延伸,只是依照人类头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3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20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274页。

④ [美]布莱恩约弗森、[美]麦卡菲:《第二次机器革命》,蒋永军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61页。

中的既定目的作用于劳动对象,其特定的意向结构反映的是人类预先设计好的内容,在被输入算法后不可自主篡改,具有受制于人的被动性。

诚然,人工智能的逻辑运行过程包含概率性与选择性,但人工智能类脑系统源自人类预设,是人类智能劳动的作品而非人工智能自主形成的,此类所谓人工智能的创造活动完全依赖人类基于劳动实践形成的一般智力,而并非其自然属性的演进。“模仿和执行规则不能称作创造性……这种(主体本性)比例和相称不是遵循规则和机械模仿就能导致的。”^①当人工智能因外界不可抗因素而行动受阻时,拥有既定算法的机器并不能给出相应的解决办法;而人类智能并不需要目的预设,且会在实践中随着生产经验累积而不断调整行动和目的,其能动性和无限可能性正是体现在此种变化上,“即便计算机的复杂性和容量与人脑相当,也仍然无法与人类智能的灵活性相媲美”^②,将人工智能的工作过程视为具有劳动的“对象性”这一判断过于技术化,忽视了实际生产生活逻辑,这是对人工智能本质的误解。事实上,执行算法命令是人工智能的本质特征,准确、完整、无误地完成人类为其设定的针对固定劳动对象的命令是其主要任务。而受客观世界不可穷尽性、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制性影响,人类生产过程的对象性认识具有不确定性,这是机器和自然物与人的本质区别。只要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并存,这种反差就一直存在:人类智能越进化,其不确定性就越强;人工智能越进化,其确定性就越强,人工智能不断进化的确定性属性决定了其无法自主适应人类生产过程,不具备属人性。拥有巨大生产效率的人工智能体系,只是人认识、利用、控制、改造和创造的对象,是人的意志用来支配自然界的器官。

再次,人工智能不具备社会性。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实践的。”^③人在实践中最本质的属性就是社会性,“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之所以不能完全揭示思维的本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思维和思维着的人脑是社会运动的产物,思维是同社会实践相联系的对于客观存在的复杂的反映过程”^④。而人工智能没有道德、情感、精神等人类特性,不能形成具身体验与实践认

知,无法与人类形成社会关系。马克思强调,物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结果,或者说是人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能动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不具备主体能动性和对象规定性的人工智能仅是人类劳动形成的技术存在物,是以人类智能为原型的技术再现,只是执行人类指令而并不考虑社会意义、社会责任和社会后果,脱离了主体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就不能形成主体真正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属性。价值原生的社会性决定了其只能由同样具有社会性的活劳动创造,单纯从技术层面展开研究往往会遮蔽人工智能背后的社会属性。因此,只有在以人类主体性为基础的社会性维度分析框架下才能使人工智能本质得到真正的追问与解蔽,强行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嵌入人工智能无疑会使人工智能成为解构社会甚至颠覆现存社会秩序的破坏性因素。

人类的利益诉求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一切客观条件的总和,人工智能在根本上是人类利益边界与利益诉求的技术载体,而非有意识地通过劳动谋求自身利益的劳动主体。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是由具有独立利益诉求和利益边界的现实的人生产的,“商品所有权来自生产者本人的劳动”^⑤,每个商品生产者都是各自劳动产品的所有者,商品价值在此过程中表现为人类劳动的社会形式,在市场交换中通过让渡商品所有权实现生产者各自的利益诉求。反观人工智能,它只是劳动工具的集合,决不是人的各种劳动的组合,其自身不具备利益诉求与利益边界,在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中强行介入人工智能,不免落入庸俗经济学的窠臼。实际上,人工智能在物质生产领域构成了强大生产力,但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不具备主体性的人工智能无法构成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和社会关系,更无法替代人类主体性。唯有人类能

①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李秋零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0—331页。

② [美]库兹韦尔:《机器之心:当计算机超越人类,机器拥有了心灵》,胡晓姣等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XVI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页。

④ 肖前、李秀林、汪永祥:《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⑤ 毕肖辉:《关于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新思考》,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有意识地通过劳动谋求自己的利益,将生产商品的活劳动对象化为价值。

因此,不具备能动性、创造性和社会性的人工智能仅是人类劳动形成的技术存在物,“是以人类智能为原型的技术再现”^①,所谓人工智能的“有目的的活动”,究其根本是人类预设的,源自人类劳动创造。“人类凭借对自身理性思维能力以及机器工具机械属性的认识,将自身设定为技术的绝对主导者,因此技术工具对人类主体的僭越在根本上是无法饶恕的。”^②人工智能是由人类创造的技术工具,旨在提升人类的自主性和价值。无法替代人类主体性的人工智能不可能成为劳动者,更不可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

二、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劳动仍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

人工智能生产范式下,伴随直接生产过程中活劳动的日渐式微,社会财富的指数级增长带来了人工智能具有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劳动者属性的幻象,这促使学界开始思考如下新问题,即人工智能是否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应当明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关于价值源泉的本质规定。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③。商品价值作为人类一般劳动的耗费,是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如上所述,人工智能不具有劳动者属性,其在生产中的普遍应用不可能改变商品价值的实体和本质,人类劳动毫无疑问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正如马克思所说,价值实体中除了人类活劳动凝结以外,不包含任何其他物质的因素。^④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显著特征之一的人工智能催生了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在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炫目的作用,这也使得部分人产生了人工智能生产范式下价值源泉是否多元化的疑问。其实,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在劳动过程的三个要素即劳动者的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当中,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都不创造价值,作为劳动资料的人工智能自然也就不可能创造价值,只有劳动者的劳动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可见,无论科技如何进步和生产方式如何变革,决

定价值的因素始终是一元的。马克思通过考察科学的发展水平及其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同劳动生产力的关系,认为决定劳动生产力的因素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及其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由此可见,发生多元化发展的是决定劳动生产力进而决定财富生产的因素,而不是决定价值的因素。进而论之,人工智能的普遍应用进一步深化了社会分工,扩展了生产链条。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认为,随着科技和分工的深化与发展,劳动过程被分解了,由此形成了一种在协作中生成的有机生产关系,即“总体工人”。“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⑤。人工智能时代的商品生产过程包括直接生产过程和间接生产过程,前者表征为直接劳动不断减少的人工智能生产,而在后者中却蕴藏着无穷的人类间接劳动,人类劳动表面上的减少丝毫不影响其作为价值唯一源泉的本质。人工智能表现为脱离人类掌控的独立个体,但从根本上看,它是人类劳动能力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系统拓展至人的身体之外的中介。作为人类创造的技术存在物,人工智能“之所以取得巨大进步,既得益于计算能力的指数级增长,也得益于我们现在可以获得大量的数据”^⑥,其所赖以存在的数据无一不来自人类活动的寸积铢累,其跨越时空边界的数据传输能力皆源自人类劳动创造,脱离人类实践活动,人工智能便无法富集数据并将其转变成数据资源,其非同寻常的运算能力也会随之烟消云散。对于需要专业知识、逻辑推理或领域迁移的复杂任务,当下人工智能系统的深度学习能力显然远远不足,且目前的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还是典型的“黑箱”算法,其应用极易引致安全和伦理风险,存在极强的不确定性。

① 刁生富、吴选红、刁宏宇:《重估:人工智能与人的生存》,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第6页。

② 鲍金、黄婧:《智能时代人机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审视》,载《思想理论教育》2023年第11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57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50—5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582页。

⑥ [德]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李善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人工智能技术在将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中,分别作用于生产力中物的因素(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和人的因素(包括工人、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一方面优化劳动资料,拓展劳动对象,另一方面也造就了素质更高的劳动者。高素质的人和高效能的物相结合,使生产工人的活劳动作为更复杂的劳动能够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究其本质,人工智能生产所“创造”的价值仍然表现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如果没有生产人工智能这一产品的劳动,其自身是不能生产出产品的。实际上,人工智能是人类劳动意识和劳动目的的载体及承担者,在算法的作用下,人类劳动实现了对人工智能劳动的预测与操控。人工智能看似成为摆脱人类智能的独立个体,但在本质上依旧是人类劳动的对象化产物,是模拟人脑智能功能、复现人类智能劳动、延伸人类智能行为的智能器官。故而人类智能并不是被取代了,而是退居智能设备的背后,人工智能生产方式下的商品价值,同样“并非来源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能力,而是来源于机器使用的劳动能力”^①,活劳动仍然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

在以数据、算法、系统等为支撑的智能化生产方式之下,人工智能与资本相互嵌合引致的剩余价值生产新态势进一步佐证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早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②纵然表面上“无人工厂”“无人车间”中劳动者的肉身隐匿成为技术乐观主义者口中的劳动解放,但实质上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在生产中的此消彼长却在无形中加深了资本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奴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被归结为资本的力量,“资本真正的魔力就在于它通过镜像将所到之处的一切对象性存在变为它的同谋”^③。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表现为机器与科学的应用,代表最高生产能力的人工智能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劳动剥削的工具,以及对这种剥削的强化。人工智能作为人们制造出来的辅助提升劳动能力的手段,被吸收到资本当中,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但人工智能并不是永续的,对生产过程的参与具有周期性,超过其生命周期,就会退出生产过程。

在这一层面上,人工智能符合“逐渐消费的资本”的属性:全部进入劳动过程,并按照磨损程度部分进入价值形成过程,其使用价值在较长的时间内发挥作用,其价值则按照在每次生产中的磨损程度逐渐转移到新产品中去。随着资本积累进行和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不仅会相对减少甚至会绝对减少。为了扩大个别价值与价值之间差额的“福利”,资本家大肆应用人工智能介入生产,资本对他人劳动的贪欲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强化,悄无声息地盗取他人劳动时间,以求在商品售卖之时获得更多超额剩余价值。在此过程中,人工智能不仅以异己的力量奴役人,同时也将人完全剥离在生产过程之外,劳资关系中赢家通吃的“马太效应”使得普通劳动者与顶层资本家在收入上的鸿沟日益扩大,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更为隐蔽的剥削。

显而易见,资本逻辑之下的雇佣劳动剥削在人工智能时代进一步强化,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进一步转变为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的对立,数字资本逻辑几乎被强加于整个人类生活。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劳动没有特定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场所,但是这种时间与地点上表现出的所谓自由实则形成了新的奴役机制:劳动与闲暇、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微乎其微,在资本逻辑下生产与生活逐渐融为一体,数字劳动“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④。所谓休闲的网络购物、短视频浏览都在无形中成为创造数据的数字劳动,并为算法所吸纳,人们每时每刻都陷入了被资本家盘剥的泥淖。而作为数据创造者的用户并未享有对数据的所有权,资本家以其对数字平台的所有权无偿占有这些价值,并将其出售给广告商以加强对消费者的精准信息投送,由此完成数字平台与广告商利益勾连下的无形剥削。强大的资本逻辑将非资本化要素纳入资本中,扩大资本剥削范围,这些非资本化要素不得不遵循资本强加给它们的逻辑,成为资本实现盈利的手段。

以上论述充分证明人工智能仅是人类前置劳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92—93页。

③ 金姿姝、余达淮:《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价值论”的当代价值透视》,载《天府新论》2021年第4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463页。

动的机器载体,是客体性劳动资料,“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①,不可能具备价值创造属性。“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②因此,尽管以劳动资料形式存在并参与生产过程的人工智能可以大大提高社会财富的生产效率,但其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即使其自身价值尚需在生产过程中借助劳动者的具体劳动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人类劳动仍然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

三、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 人工智能生产

历史唯物主义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推动人类社会由低及高的杠杆作用。智能化生产方式下,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必须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更为全面、客观地破除人工智能时代对劳动价值论造成的迷思。“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③

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生产方式演进的历史,“生产方式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而是在历史中作为一个尺度,区分着不同的历史阶段”^④。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在经历多次经济危机后存活下来,继而创造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能容纳的强大生产力,很大程度上源于资本统治下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和产业部门的全面革新。人工智能是人基于对世界与自我的认知而创造出来的“物体系”,是体现人与物双重本质、延伸人的能力的人造“有机体系”^⑤,不仅拓展了人类的手与脑的功能,而且是社会逻辑的物性表达。作为“拥有自驱动能力的智能型劳动资料”^⑥,人工智能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力利用的对象。“机器在物质上的威力超过个人的以及任何特定群体的体力这一无情的事实,使得机器成为任何以机器生产程序为基本结构的社会的最有效的政治工具。”^⑦人工智能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应用比重逐渐

增大的直接后果就是,“资本对劳动的粗暴否定和对劳动新的更隐秘的、更强大的统治,是社会彻底的撕裂和系统性社会危机的爆发”^⑧。人工智能时代,无产阶级仍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创造者,资本家则是将剩余价值转为盈余资本的绝对攫取者。

如上所述,人工智能并没有改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人是唯一劳动主体”以及“活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科学论断,“人工智能威胁论”沸反盈天不外乎源自资本逻辑对技术的统摄。“尽管劳动方式各异,但是,所有这些劳动方式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人类的劳动被剥削。”^⑨伴随科技革命的日益深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对人工智能所创造的强大社会生产力产生限制。人工智能变成强化劳动的工具,这使得本为中性的技术进步却站到了直接生产者的对立面,技术进步始终从属于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目的,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人工智能同商品、货币一样,本身并不是资本,只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并作为剥削雇佣工人的手段时才是资本,作为一种同雇佣工人敌对的力量发挥作用。“作为原因又作为结果的资本……被其自身固有的规律即利润率鼓舞着,这个规律推动它不断地生产以便不断地扩大自己”^⑩,将劳动贬低为生产过程中不起眼的要素,在悄无声息中将人工智能转为资本宰制劳动的手段。“从17世纪到21世纪,人类历史一再证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所引起的机器对无产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9—60页。

③ 习近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载《求是》2020年第2期。

④ 蓝江:《数字劳动、数字生产方式与流众无产阶级——对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蠡探》,载《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2期。

⑤ 涂良川:《马克思“机器论片断”的机器技术哲学叙事》,载《哲学研究》2022年第9期。

⑥ 胡磊、任焯:《马克思机器观视域下人工智能的本质和应用探析》,载《改革与战略》2020年第9期。

⑦ [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⑧ [黎巴嫩]迪别:《资本主义危机与社会主义前景》,唐芳芳译,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1期。

⑨ 周延云、闫秀荣:《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数字化时代国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5页。

⑩ [法]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榭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0页。

级的排斥,在资本主义的各个时代都是广泛存在的。”^①这种生产关系维度的基本矛盾,决定了智能化生产方式下的资本主义同工业资本主义一样充斥着资本与劳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资本主义由于自身的运动规律将成为历史上被淘汰的制度,而资产阶级将成为一个被淘汰的阶级。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将创造出扬弃和消灭资本主义的条件以及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成为加速社会革命和新生产方式产生的因素。

化解人工智能使工人陷入异化困境的方法难道是像卢德分子一样,放弃人工智能在现代生产中的应用甚至于消灭人工智能?还是如扬·海恩·多纳尔所说,“如果与‘深蓝’对战,我将会带一把锤子”^②?答案显然是相反的。人工智能诚然造成了劳动的“新异化”,但同时也蕴含着人类解放的发展前景。要使人工智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③。只有在工人成为统治阶级的社会中,才能破除人工智能使用中的资本逻辑统摄,以科学理性的方式应用人工智能造福于人类,避免人工智能成为社会表意系统中否定人类本质能力并终结人类命运的技术他者。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使人工智能变为公共的、属于全体社会成员的财产,人工智能对人类智能的替代将加速劳动转型,成为自由人谋求全面发展的手段,从而“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④。人工智能的共产主义应用将推动人类迈向彻底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的新的历史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它即将炸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工智能私有制所导致的生产桎梏,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下异化劳动的消除所带来的人类的彻底解放。

进而论之,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工智能发挥出的巨大生产力,将不再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而是被用来造福全社会,形成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工作方式。“技术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选择,甚至是自由。”^⑤人工智能将成为节约劳动时间的强有力手段,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人们可以“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

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⑥。技术将服从于使人的才能得以自由发挥的要求,成为实现人类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引擎。

四、结 语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随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创新发展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⑦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工智能,不具有劳动者属性,不能成为物质生产活动和非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自然不会成为价值的源泉,作为人类物化劳动嵌入其中的劳动资料参与生产过程,不具备创造剩余价值的属性。因此,“人工智能创造价值 and 剩余价值”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是同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根本对立的。随着人类社会日益迈向唯物史观所揭示的路向,劳动者将彻底从人工智能加持下的空前强大的资本枷锁下解放出来,人工智能日益成为推动全体劳动者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巨大物质力量,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不仅不会成为无所事事、丧失能力的“全新而庞大的无用阶级”^⑧,反而会像马克思恩格斯所科学预见的那样,成为“掌握着未来的阶级”^⑨。

(刘儒: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韩丹丹: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甲秀)

- ① 蒋红群:《无产阶级会沦为无用阶级吗?》,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7期。
- ② [美]布莱恩约弗森、[美]麦卡菲:《第二次机器革命》,第258页。
-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80页。
-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204页。
- ⑤ [美]布莱恩约弗森、[美]麦卡菲:《第二次机器革命》,第14页。
-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7页。
- ⑦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 ⑧ [以色列]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293页。
-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1页。